

最后一次集结

1937
2012

方军 © 著



二十九军老兵在卢沟桥上 最后一次集结

1937年7月7日，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端，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英勇抗击日寇。当年的抗日英雄，如今何在？

2007年，方军从960万平方公里的某几个角落，找到了九位健在的老英雄，虽都已是耄耋老人，但他们愿意回到当年的战场，庄严地，最后一次集结。2012年，方军将他们的口述历史整理成集。勿忘历史——这既是中国人应牢记的，也是日本人应反思的。





最后一次集结

方军 © 著

©方军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一次集结 / 方军著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205-07331-2

I. ①最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6248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(邮 购) 024-23284324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(发行部) 024-23284304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70mm × 242mm

印 张: 16.75

插 页: 1

字 数: 24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姜 瓴

封面设计: 李 辉

版式设计: 郝 强

责任校对: 吴艳杰 赵 莹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7331-2

定 价: 30.00元

法律顾问: 陈光 咨询电话: 13940289230

| 序 |

为什么要“最后一次集结”

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采访、记录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们。

我1991年留学日本，从那时开始到1997年，在日本国采访了22位原侵华日军老兵。1997年至今，又有12位侵华日军老兵到北京找我，联系谢罪事宜。这些，中央电视台、山东电视台、江苏电视台、四川电视台都有过报道。

回国后不久，我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，后来退休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在国内采访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、老新四军、国军抗战将士、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、被日寇强暴过的妇女、被日寇强掳为奴的劳工、东北抗联等老兵，前前后后，采访过数百人，其中，有多位亲历七七事变的原二十九军老兵。本书正是叙述采访他们的经历和过程。

七七事变发生在1937年的北平，二十九军是北平的守军。七七事变把二十九军推向了全面抗战的最前线。

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，但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，在北京只有三处，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、赵登禹路，东城区的张自忠路。这三位英烈，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，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，后来都曾是二十九军将领，自1934年二十九军驻防京津地区后，他们都曾在北京居住。



1952年，毛泽东亲自为佟麟阁、赵登禹、张自忠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。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的认可。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：佟麟阁路、赵登禹路、张自忠路，得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，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，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过后，拨乱反正，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。

2007年，为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，并纪念在七七事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和牺牲的二十九军将士，我邀请九位仍健在的二十九军老兵，在7月7日这天，到他们曾以血肉之躯拼死保护的卢沟桥做最后一次集结。7月6日，《北京日报》在最醒目的位置刊登以下消息：

明日，是七七事变70周年。当年，亲历卢沟桥事变的二十九军老兵从祖国各地，集结在卢沟桥畔。他们要以毫耄之躯，纪念为国牺牲的军人们，缅怀抗日战争的前仆后继、流血牺牲。他们是：崔金品、赵金典、马步先、李鸿斌、张可宗、孙敬生、赵新立、吴江平、沈甸之。他们所留下的照片，应该是最精彩的历史照片，是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象征。



2007年7月6日的《北京日报》

北京的读者除了对二十九军健在老兵感兴趣外，还对该活动的组织者感兴趣。所以，《北京日报》在七七事变纪念日的前一天，拿出一个版面，对此事做了专访。在专访中，我再一次表达了我的观点：通过“最后一次集结”表现出二十九军老兵的现状；二十九军老兵的心路历程；二十九军老兵人生的悲欢离合；二十九军老兵留给这个世界的警世恒言；二十九军的历史沿革；二十九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；二十九军在战争后的归宿。

在“最后一次集结”活动中，香港记



者、日本记者向我提问。我回答了三个问题。

首先，我给七七事变下个定义：今天是七七事变70周年，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日子。因为这个日子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，同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；另外的一层意义，七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的爆发点；七七事变的最后一层含义，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的开端。

其次，我总结了中国人民为什么关心抗战历史：1931年到1945年，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，在这场战争中，中国民众死伤3500万人。不管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，还是七七事变，还是南京大屠杀，这些话题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沉重的。中国政府提倡“以史为鉴，面向未来”，不光是对自己国民的启示，也是对其他国家民众的提示。

第三，我总结了组织“二十九军老兵时隔70年，再一次在卢沟桥上集结”的意义。七七事变已经过去70年了。今天去了卢沟桥的九位老兵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因为研究战争史离不开三个要素：人证、物证和口述史。今天来的这九个老兵都能回忆起70年前在七七事变当中所经历的战役和战况。这对于我们研究在抗日战争中，我们国家屈辱的历史，和英勇反抗侵略者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十分难得的资料。我个人认为，他们的这种精神，在今天仍然应该得到发扬光大。

当时，在卢沟桥上“最后一次集结”的二十九军老兵有：

崔金品、赵金典、马步先、李鸿斌、张可宗、孙敬生、赵新立、吴江平、沈甸之。

到我写作此文时，张可宗、赵新立、吴江平、沈甸之四位老先生仍健在。

2007年7月6日，二十九军老兵集合在卢沟桥宾馆内演练。

老兵们演练的是：稍息、立正、报数、自我介绍。

老兵们在卢沟桥宾馆内演练的最后一项：振臂高呼口号：

“为国家牺牲的军人万岁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！中华民族万岁！”

想起无数倒在侵华日军枪弹下的战友，老兵们老泪纵横！

2007年7月7日中午，“最后一次集结”活动结束，但昨晚他们演练的最后一项却并没有实施。老兵们深感遗憾，因为他们又一次想起了70年前共同浴血奋战过的战友。

我认为，浩瀚的抗日战争巨著的最后篇章，就是以写实的笔法记录战争



亲历者的心路历程、悲欢离合、生死离别、警世恒言的。随着战争亲历者的自然离去，这部抗战巨著就合上了最后的篇章。下一部关于战争的巨著什么时候打开扉页，不得而知。我们人类社会，正是伴随着战争的脚步走到今天的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的写作风格受原侵华日军鬼子兵的影响很多。他们从来不说“中国政府军怎么样，八路军怎么样”，在他们眼中，都是曾经的手和敌人。所以，在我采访记录中，很多时候，会不自觉地忽略了老兵们曾经的身份。在我眼里，他们都是民族英雄。

写作此文时，我在新浪、腾讯上发布微博：

“日本人会在弹冠相庆的同时，会默默向你们致敬。当年，国军在正面战场和日寇血战，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……残阳如血、万籁俱寂。国军抗战老兵重整旗鼓、挺胸抬头，以耄耋之躯，以蹒跚的步伐，以民族的自尊，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。”

这段微博，也表达了我出版此书的目的：记录一段国家的历史，以供后人思考。

方 军

2012年3月6日



目录 · Contents

序 为什么要“最后一次集结”	/ 1
韩立才 七七事变最后的证言者	/ 1
金振中 卢沟桥前线的直接指挥官	/ 30
杨云峰 抡起二十九军的大刀	/ 53
王延洲 王牌飞行员的抗日史	/ 69
王世江 从国军士兵到解放军司令	/ 84
沈甸之 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的人生	/ 101
马步先 卢沟桥事变的“活字典”	/ 115
孙敬生 我想要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	/ 123
张可宗 黄埔十八期毕业生	/ 130
付锡庆 杀过日寇，也扫过大街	/ 139
刘思远 夜潜敌营的“奋勇队”队员	/ 150
王自治 为国家而战的老兵	/ 162



崔金品 我想和温总理握手	/ 175
姚爱华 战地救护队的女护士	/ 201
赵新立 回忆七七事变经历	/ 215
王寿延 脑壳被打凹的二十九军军医	/ 224
崔蕴秋 迟来的葬礼	/ 235
延伸阅读 二十九军小史	/ 242
七七事变时二十九军战斗序列	/ 249
七七事变时日军战斗序列	/ 251
参战卢沟桥事变的部分日本军人小记	/ 252
为何祸起内陆?	/ 255



韩立才：七七事变最后的证言者

作为专门写作抗战文学的作家，我认为，战争风云，是随着战争亲历者的逝去而自然远去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不在了，这本战争的巨著就合上了，这段战争的历史就完全走进博物馆和教科书中了。

但是，战争亲历者的离去并不代表一段战争历史的消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甚至在战争亲历者还健在的情况下，已经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造谣惑众了！

比方，今天日本国还有人大放厥词，竟然信口雌黄说“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”。其实，这一类谣言不攻自破的原因很简单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之中的幸存者还有不少人活到今天。这本战争的巨著还没有合上、放入历史的书柜哪！

然而，随着卢沟桥事变最后的亲历者的离去，这本战争巨著也将成为历史，成为资料库、档案馆、历史研究所、教科书里的文字史料了。

一、给 70 年^①前七七事变这段历史画上句号的人物

根据我个人调查：亲历 70 年前七七事变的二十九军老兵目前健在的还有 7 人。
88 岁，在重庆市的张可宗先生。

^①本文写于 2007 年。



96岁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韩立才先生。

88岁，在北京市朝阳区的马步先先生。

94岁，在天津市河西区的孙敬生先生。

91岁，在河南省项城市的崔金品先生。

88岁，在江苏省南京市的李鸿斌先生。

94岁，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刘钧铭先生。

那么，怎么单单96岁的韩立才先生才是能给70年前七七事变这段历史画上句号的人物呢？我8年前开始调查、研究、采访健在的曾经在卢沟桥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二十九军老兵，而96岁的韩立才先生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。时至今日，他还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70年前卢沟桥事变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清晰地回忆起所有相关人物！我采访了他数天，有现场录制的6盘录像带为证！我认为，迄今为止，这是70年前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“口述历史”的资料。

70年前，七七事变发生时，韩立才正在北平，那时，他参加二十九军已经一年多了，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做科员，中尉军衔。这个公署是当时华北四省市（北平、天津、河北、察哈尔）的最高军事机关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。

与侵华日军不同的是，70年前的二十九军官兵多是文盲，或者说，70年前



96岁的二十九军老兵在病榻上接受方军采访



的中国军人多是文盲；而韩立才先生那时就是“大知识分子”了。让我们看看他的简历吧！

1913年1月生于河北盐山县。

1931年到北京上高中。

1933年回到家乡做教员。

1936年参加二十九军，分配到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。

1938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十六期。

1941年毕业后到五十九军（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扩编，初军长张自忠，张自忠阵亡后为刘振三）参谋处任参谋。

1944年任五十九军特务营营长。少校军衔。

1948年11月在台儿庄附近起义，后升任团长。上校军衔。

1949年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政大学学习，6月到华东军政大学教员班进修。

1950年1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工作。

1951年11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工程兵学校任教。大尉军衔。

1958年转业到邯郸，开始在邯郸铝制品厂工作。

1962年到邯郸市金属公司任副经理。

1966年开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迫害。

1983年1月离休，到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，笔耕不辍至今。

我是怎么认识韩立才的呢？1986年，我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，买了一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《七七事变——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》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关注韩立才这个人物。我十年前出版一本《我认识的鬼子兵》的书，其中，在第150页、151页引用了他的相关文章。8年前我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三位同志专程去他家。这次，又一次会面，他对我说：“……自1949年以来，我和中国大陆一侧二十九军原官兵通信4600多封，和台湾的原二十九军官兵通信540封，全部认真保留。1983年以来，我写的文史资料有50万字。”

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能“打”不能“说”，他就不具备给一个久远历史画句号的资格。

一个历史性人物能“说”不能“打”，他也不具备给一个久远历史画句号的



资格。

一个历史性人物亲历战争风云，但是英年早逝，卢沟桥事变的句号让他怎么画？

一个历史性人物既抓过枪杆子又能说会写，卢沟桥事变的句号不是他画谁画？

二、紧迫的采访任务

前不久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有人自称是韩立才的孙子，通报说：“韩立才病危，肝癌晚期、肝腹水……”我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韩老什么时候有儿子，还有孙子？怎么你在南京，而韩立才在邯郸？你又是怎样知道我的电话？……”

我和韩老常常联系。几天前，我们刚刚通了电话，电话里韩老还开玩笑说：“我刚刚引用了你的文章段落，可别起诉我呀！”

韩老孙子的电话让我有点将信将疑。

刚好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找我。因为我在人民网日本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“关于在卢沟桥宛平城建立二十九军驿站的设想”的文章。今年是卢沟桥事变 70 周年，馆长找我问问“建立二十九军驿站”的可行性。我急忙利用这个机会煽动采访韩立才的重要意义：“如白驹过隙，稍纵即逝呀！”沈馆长听了我的叙述马上拍板：“你代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去采访老兵韩立才。”

我真是受宠若惊。我退休 5 年来，一直是自费采访抗日战争亲历者的。这些人物有老八路、老新四军、国民党抗战将士、被强掳劳工、被日军强暴的妇女、爱国华侨、美国飞虎队队员、东北抗日联军战士、日军遗留子女、战争受害者。我认为，“人证、物证、口述史”不但是战争博物馆构成的主要因素，同时，也是相关战争文学所必不可少的内容。

我的退休金千元上下，我把住房租出去，自己住更窄小的，还是捉襟见肘。

如若不是天下好汉鼎力相助，我会更为难些。

这些年来，这是我头一次得到来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明确的支持。

说干就干，我收拾行囊，立即前往河北邯郸找韩老爷子。

韩老见了我很高兴，他说：“今年是卢沟桥事变 70 周年，我要抓紧把相关的回忆录写出来。我的病会好的，我是个士兵！”我听了心里很难过。



韩立才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肝癌晚期、肝腹水。医生和周围的同志都不告诉他，担心他听了以后心理负担过重。

由于96岁的韩立才是孤寡老人，所以，韩老单位的张海滨经理、党总支副书记李俊英就无微不至地照顾韩老。李书记说：“公司已经向政府申请了破产，什么时候批下来还不知道，工人们现在连发工资都困难。但是，韩老是70年前在卢沟桥同日寇血战过的，我们地方干部一定以最完美、最和谐的方式送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。”

医生对我说：“他很重，最多两个月。——这张病床是他人生最后的归宿。”

我看见韩老已经不能进食，而且腹胀如鼓了。

张海滨经理悄悄告诉我：“一天不如一天。”

我握着韩老的手一时百感交集，更加深切领会了“风烛残年”这一词汇的含义。

躺在病床上的韩立才对我说：“咱们两人认识整整8年了，从卢沟桥事变算起，8年抗战都胜利了。8年来，我们之间通了无数信笺，通过无数次电话。我们为某个问题义正辞严地争论过，你争论不过我，每一次你都采取不回信的态度对付我老头儿！是不是？！”

我紧紧握着韩老的手笑哈哈地说：“我说不过你，我是好男不和老头儿斗。”

韩老认真地说：“不对！是你错了，理屈词穷！”

我说：“对、对、对，是我错了。”

韩老说：“你在人民网日本版上的文章我都看过，我很关注你呢！”

我的头一下大了，我说：“不可能，你96岁老头儿怎么会上网呢？”

韩老笑了：“我孙子在军队当中尉军官，是他给我下载来的。你是政府军、中央军、地方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、侵华日军都采访过的人。我和我的儿子、孙子都关注你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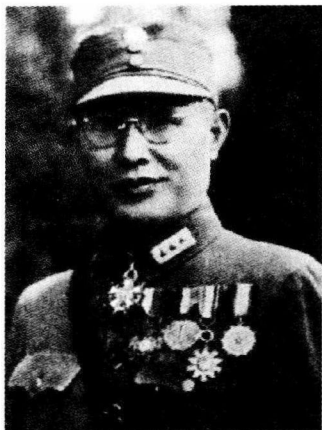
我急忙问韩老：“你什么时候有儿子、孙子的？”

韩老看我支起摄像机，安好录音笔，我的同事张英秋摆开记录的架势，就坐了起来。

“这是大事儿，不能躺着说。”韩老来了劲头儿：“让我说什么？从哪说起？”

我说：“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，就从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说起吧！”

韩老说：“几十年来，有无数年轻人问我同一个问题，七七事变时的侵华日



《何梅协定》签署时的何应钦



《塘沽协定》签署现场

军是怎么来卢沟桥的？他们从天上掉到卢沟桥上的吗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向华北蚕食，他们138名骑兵刀不出鞘就占领了承德。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，侵华日军得寸进尺、步步紧逼。他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1933年逼迫中方签订《塘沽协定》。后来，1934年何应钦又不得已和侵华日军签订了《何梅协定》。1935年，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了《秦土协定》。所以，日本军队在北平有驻军。”

韩老向我强调：“这些都是不平等条约！知道吧？是侵华日军强加给中国人的！”

韩老喘着粗气、瞪着眼睛说：“后来，才有波及全中国的、1935年震惊中外的‘一二·九’学生运动，才有了1936年12月12日的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！……知道吧？”

我说：“哎呀，老爷子，您休息一下再说吧！七七事变70年，您只说七七事变！”

韩老又不高兴了，他瞪着眼睛说：“没有不平等条约、没有‘一二·九’学生运动、没有西安事变，卢沟桥事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你不让我说别的事情，用心何在？居心叵测！”

“您不是年纪大了嘛，所以，只让您说说您亲历的1937年的七七事变！”我解释。



三、韩立才口述

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以后，逐步向华北蚕食鲸吞，政治事件、军事冲突不断发生。1935年，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伪冀共防共自治政府，日军在通县驻有重兵，就在肘腋之下，给防守在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以较大的威胁。当时，居住在北平的达官贵人、富商大贾，一个个地陆续南迁；有些工厂、商店被迫停业或减员，失业者越来越多。大街上，胡同口，电杆上，到处贴了一些“吉房招租”的红条子。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，搬进去以后，不是卖大烟就是招众聚赌，不但不付房租，昼夜还不许关门，房东们都叫苦不迭。

在北平的日本驻屯军，经常制造事端，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。他们派出便衣特务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大便，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打鸟。两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群众，人人怒目而视，义愤填膺。但是南京政府一再强调要睦邻友好，忍辱退让，大家只好忍气吞声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从1936年夏季开始，日军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。他们的步、骑、炮、工、通以及坦克、装甲兵等各兵种，从通县出发，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。日军穿城而过，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，市民对此无不愤慨至极。一个主权国家，竟容忍



卢沟桥事变爆发前，二十九军与日军对峙。图为二十九军士兵摆出不屈服的样子，警告曾经在喜峰口对阵的手下败将们



七七事变前，北平市民打出横幅支持二十九军抗日

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对这个文化古城的践踏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！

1937年5月以后，北平附近的日军频繁调动，迹象越来越明显地表明，日军要搞军事行动，社会舆论也呼吁北方当局要做好应变准备。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中尉科员，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，干部来自第二十九军和东北军两部分。当时大家一上班就议论抗日问题，许多人认识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，对日本人侵略罪行愤慨万分，并表示决不当亡国奴！

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盐山县，距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故乡（山东乐陵县）只有30多华里。第二十九军军部里有许多我的同乡，有时我到南苑军部去看望他们，每次都遇到他们在议论中日战争的前途。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速胜论者，他们说：“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，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，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、装备好，但作战经验不够。我国的军队在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又是在国内打仗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皆对我军有利。日军劳师远侵，补给困难，语言不通，情报不灵，困难重重，用不了一两年时间就会被拖垮。他们还谈到，中国这么大，把日本全部军队都摆到中国来，一个县能有几个日军？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，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，迟早会被收拾掉。听到这些议论，我也觉得有道理，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，早打比晚打强。”

冀察绥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，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，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，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傅占魁主持。卢沟桥事变前，宋哲元到绥署召集全体干部讲了两句话。宋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